

结构性排斥与韧性生存：南亚移民政策比较下的中国新移民的社会适应^{*}

孙丽芳¹, 方朝芬²

(1. 云南艺术学院 人事处, 云南 昆明 650500; 2.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南亚各国移民政策差异使中国新移民面临结构性排斥。印度签证与经济限制致华人减少; 巴基斯坦宗教绑定吸引少数族裔但限制流动; 不丹血统主义强化隔离; 孟加拉国经济吸纳与身份剥离并存。对此, 中国新移民采取差异化韧性策略: 巴基斯坦少数族裔借宗教社群参与中巴经济走廊; 印孟劳务人员靠合同循环谋生; 中企员工跨国轮岗避限; 不丹移民群体代际妥协平衡身份与文化。研究表明政策排斥强度与适应策略动态适配, 为南亚移民治理与国际合作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结构性排斥; 韧性生存; 南亚中国移民

【中图分类号】D523.8; D820; 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086-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10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语境中, 跨国人口流动已成为现代性扩散的核心表征之一,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移民接收国的政策范式差异深刻形塑着移民族群的生存境遇与发展轨迹。聚焦南亚次大陆这一具有地缘政治复杂性与文化多元性的区域, 其内部移民政策的异质性特征尤为显著——这种差异不仅外显于入籍准入门槛、签证管制强度等制度层面, 更通过经济排斥机制与文化区隔效应对中国新移民形成结构性排斥。由此, 研究拟基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及不丹四国移民政策的比较分析, 系统解构中国新移民的适应性策略。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框架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重构了国际人口迁移格局, 南亚地区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明交融特质及政治经济转型特征, 持续吸引着中国新移民群体的迁入。然而, 该区域移民政策的显著分化对中国移民的跨境流动路径、社会融入机制及生存策略选择产生了复合性影响。具体而言, 巴基斯坦实施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 尤其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跨境少数民族形成制度性吸纳, 这些群体已在当地建构起具有经济活力和文化特色的社群网络; 印度采取高度管控的移民规制, 严格的签证制度与入籍程序构成中国移民长期居留的主要障碍; 孟加拉国以劳务输出导向型政策为主导, 而不丹则侧重于政治庇护型移民接收。此类政策差异直接导致中国移民在南亚呈现差异化分布格局, 即巴基斯坦形成相对稳定的族裔聚居区, 印度境内中国移民多呈现短期流动性特征, 孟加拉国与中国移民的功能分化并以劳务属性为主导, 以及不丹的特殊政治庇护模式等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在地化图景。

面对制度性排斥, 中国新移民展现出显著的韧性适应能力, 其策略体系包括: 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渠道嵌入地方经济循环、与在地族群建立合作纽带、构建跨文化社交网络、依托祖籍国侨务支持系统维持跨国社会资本等多层面的实践。可以说, 移民群体同时运用双重嵌入策略, 既主动对接了东道国发展需求, 又持续获得母国制度性保障, 不断贯通如领事保护机制与侨汇支持等具体的网络体系, 进

^{*} **【作者简介】**孙丽芳, 女, 山东济南人, 云南艺术学院馆员, 研究方向为边疆行政管理; 方朝芬, 女, 云南曲靖人, 云南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边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海外聚居点调查研究与动态数据库建设”(23&ZD206)子项目。

而形成独特的生存韧性。

据此,既有国际移民理论为中国移民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其中推拉理论、跨国主义理论及嵌入性理论构成解释移民现象的核心范式。经典推拉理论指出,移民决策是原籍国结构性推力如政治动荡、经济贫困等影响与目的地国制度性拉力如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吸引共同作用的结果,^①揭示了原籍国推力与接收国拉力的结构性作用,^②该框架有效阐释了中国移民的经济驱动机制。跨国主义理论则着重考察移民网络对资本跨域流动的中介功能,强调华人企业通过嵌入在地社会关系网络实现全球流动,^③典型案例如巴基斯坦维吾尔族移民在保持与中国新疆文化纽带的同时,较为成功融入了巴基斯坦地方经济体系。嵌入性理论进一步揭示经济行为的社会关系嵌入特质,^④这一机制在中国工程技术移民依赖中资企业雇佣网络的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

当前中国海外移民研究主要聚焦三大维度:其一,移民规模与空间分布特征。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外移民总量已突破1 000万大关,^⑤中国移民在南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每年约有17.87万人移民孟加拉国,^⑥但南亚区域移民呈现显著的短期流动属性^⑦。历史比较表明,印度曾是中国移民的重要聚居地,然而受中印双边关系波动及经济引力衰减影响,华人社群规模从20世纪50年代的5万人持续缩减至2005年的6 000余人。^⑧其二,移民类型与动因演变。改革开放以来,新移民群体类别多元,既包括家庭团聚移民、低技能劳工移民,也包括留学、投资、技术等高技能移民。^⑨政治因素驱动下的少数民族迁徙构成特殊移民类型,而经济驱动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催生大规模技术移民潮,中资企业在南亚的工程承包业务成为重要拉力。^⑩其三,社会适应与制度挑战。华侨华人分布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移民政策、文化传统以及华侨华人的数量与规模等各不相同,身处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其生存发展状况与处境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⑪许多海外华人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往往面临就业困难和社会歧视等问题。^⑫时间维度上,多数文献聚焦20世纪80年代前的历史移民现象,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新型移民群体(如劳务输出人员、技术专家)缺乏系统性追踪;空间维度上,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单一国家案例,如印度华人或巴基斯坦维吾尔族,缺少文化联结层面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等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理论维度上,多数研究停留于现象描述层面,未能有效整合跨国主义、嵌入性理论等国际移民理论框架进行深度阐释。

基于上述分析,南亚各国移民政策的制度性差异对中国新移民的流动模式与适应策略产生多维影响,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政策调适机制与国际合作路径的探索,以促进移民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拓展国际移民理论的解释边界,更能为跨境移民治理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结构性排斥的国别化表现

在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中国新移民面临着制度性排斥的差异化形态,这种国别化的排斥机制深

① Everett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J]. Demography, 1966, (1): 47-57.

② Wang F, Fan C.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rocesse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1, (3): 363-385.

③ Henry Y, Chung W. Hybrid capitalism: a new breed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in a global era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34-257.

④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3): 481-510.

⑤ 中国海外华侨华人状况报告[R]. 北京:国务院侨办,2021.

⑥ 刁莉,田媛.“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J]. 中国市场,2023,(24): 1-7.

⑦ 商务部.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具体国家/地区[M].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4.

⑧ 致然,顽强.“扎根”的印度华人[J]. 侨务工作研究,2005,(5): 12-17.

⑨ 张秀明. 国际移民视野下的华侨华人[J]. 青海民族研究,2023,(1): 1-9.

⑩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⑪ 张秀明. 21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 1-16.

⑫ 曾少聪. 中国海外移民与中华民族认同[J]. 民族研究,2021,(4): 71-84+141.

刻塑造着移民群体的生存策略与发展轨迹。基于对南亚典型国家的政策比较分析,可将其结构性排斥特征归纳为以下两类:

(一) 印度:系统性挤压与规模萎缩效应

作为曾接纳大规模中国移民的历史性目的地,印度呈现出显著的移民规模收缩趋势。数据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华侨华人社群规模达 5 万人峰值,其中加尔各答地区在 2001~2011 年间人口锐减 37%,至 2023 年全印华人仅存约 4 000 人。^① 这种持续性规模萎缩与移民政策调整存在显著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双重制度性壁垒:其一,签证限制与行业准入禁令构成跨境流动的政治屏障,导致中国向印度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84 人,年末在印劳务人员 758 人,^② 技术移民比例持续走低;其二,经济领域的排斥性政策通过产业规制切断华人社群传统生计路径——以加尔各答皮革业为例,当地政府以环保名义实施的产业限制措施,迫使大量华人从业者因职业断层被迫迁移。

此种制度性排斥产生多重社会经济效应:在企业运营层面,中资科技企业因技术人员签证审批周期延长导致项目进度滞后;在个体适应层面,语言文化隔阂加剧职业转型难度,据调查,华人移民在转向服务业领域时面临平均 2.3 倍于本地居民的培训成本。这种“政策挤压-经济边缘化-文化隔离”的三重作用机制,最终导致移民社群的持续性规模萎缩。

(二) 巴基斯坦:民族身份的双重性困境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移民的战略性中转枢纽,其移民政策呈现出显著的民族身份双重性特征。尽管该国实施的相对宽松移民政策成功吸引了包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但这种政策包容性背后潜藏着复杂的制度性约束。值得关注的是,伊斯兰教信仰在促进维吾尔族移民与巴基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融合的同时,也构成了移民政策设计的潜在逻辑基础,即政府通过宗教纽带建构移民群体的文化归属感,进而实现对其社会空间的结构性管控。

现实数据表明,这种宗教绑定策略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2024 年巴基斯坦华侨华人总量维持在约 2 700 人的规模^③;另一方面,移民群体的空间流动性遭遇制度性限制,如维吾尔族移民跨省迁移需获得特别许可。这种居住地管制政策导致移民社群呈现显著的碎片化分布特征,如其境内大多数的维吾尔族移民集中定居于旁遮普省与信德省,难以形成跨区域的社群网络。而地理空间的区隔进一步转化为经济机会的不平等,集中体现为移民群体在非传统聚居区的就业较为困难。

上述经济领域的依附性问题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尤为凸显,大量涌入的技术工人和劳务人员普遍面临合同短期化的困境,平均合同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且多数劳工无法续签长期合约。这种雇佣模式导致个体经济收入呈现显著波动,劳工年收入之间的高低差距明显,由此阻碍了社会资本的持续性积累,社群层面的社会资本年均增长率难以稳定维系;更严峻的是,诸多短期合同工未能参与当地养老金计划,这种社会保障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群体的老年经济脆弱性。进一步从制度分析视角来看,巴基斯坦政府推行的“宗教认同置换公民权”治理策略,实质是通过将移民社群锚定在特定经济领域与社会空间来实现文化治理目标,该策略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族群文化冲突,但长期效应表现为移民群体跨领域发展能力的系统性削弱。具体而言,移民社群被迫采取适应性生存策略:在宗教实践层面强化社群纽带,经济活动层面维持合约工身份,社会关系层面构建封闭性族裔网络。这种“有限融入”状态最终将移民群体锁定在“经济依赖-社会隔离”的循环困境之中,制约其长期发展潜能的释放。

(三) 不丹:制度性隔离下的文化适应困境

不丹的移民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性隔离特征,这种隔离机制深刻影响着移民群体及其后代的生存境遇与社会融入进程。作为南亚地区唯一实行严格血统主义国籍政策的国家,不丹通过《国籍法》构建

①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②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EB/OL].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③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巴基斯坦(2024 年版) [M]. 北京: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编制办公室,2024 年.

了多重准入壁垒:外国人需满足20年居住年限(《不丹国籍法》第五条)、禁止双重国籍(第8条)以及强制文化同化(第12条)等核心条款。这种制度设计使移民群体及其后代陷入系统性困境:尽管83%的移民群体已获得不丹国籍,^①但其社会融入程度显著低于本土族群。这在教育领域的文化冲突尤为突出,移民群体后代在公立学校面临双重身份认同压力,课程体系中宗卡语教学占比较高,而家庭场域仍需维持本国语使用习惯。这种语言环境的割裂直接影响学业表现,致使移民学生平均成绩较本土学生低。身份认同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融入难度。同时,经济领域的制度性排斥集中体现于就业市场分割。不丹《劳动法》第十七条限制外籍劳工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导致移民集中在低技能服务业领域。社会保障体系的排他性设计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医疗保险覆盖率和养老保险参保率都极低。这种制度性隔离不仅限制经济流动性,更强化社会边缘地位,移民贫困率较本土居民更高。

空间分布格局折射政策排斥的深层逻辑。不丹的中国新移民主要聚居于西部帕罗宗和中部廷布宗,形成封闭性社区网络。地理集中化既是文化自我保护的结果,也受制于行政管理体系的封闭性,体现为地方政府对外来移民土地使用权审批极为严格,尽管社区内部建构起互助支持系统,但对外部资源获取渠道依赖度很高。由此,与巴基斯坦“宗教绑定型”移民模式相对应,不丹通过血统主义政策构建了另一种结构性排斥形态。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文化同化政策消解移民的族群特性,同时以经济边缘化维持移民的从属地位。这种制度设计使移民陷入“文化断层-经济脆弱-社会封闭”的三重困境,形成独特的适应性生存策略,即通过在语言学习中采取“双语切换”模式,在就业选择上偏好“家族企业”就业路径,在社会关系构建中依赖“跨社区互助网络”。这种制度性隔离政策虽短期内维持了社会稳定,但长期来看制约了移民群体的发展潜能,代际传递效应则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分层结构,简言之,通过文化适应压力与经济排斥机制的双重作用,迫使移民群体在保持族群认同与适应主流社会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形成独特的韧性生存模式。

(四) 孟加拉国:经济吸纳与身份剥离下的临时性嵌入

孟加拉国的移民政策呈现出独特的“经济吸纳-身份剥离”双重特征,这种矛盾性制度设计深刻影响着中国新移民的生存策略与社会融入进程。作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市场,该国凭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吸引了大量中国劳务人员和技术专家。然而,其移民政策却将经济贡献与身份权利割裂,形成显著的临时性嵌入特征,导致移民群体陷入“经济在场-社会缺席”的生存困境。据统计,2023年在孟加拉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仅约3000人。^②劳务移民集群的形成凸显了这一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孟加拉国的中国新移民主要由劳务人员和商贸人员构成,其工作周期普遍较短,且大多数合同未包含社会保障条款。短期雇佣模式直接导致移民群体难以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交网络密度较低,工作环境安全防护设施缺失率较高。该国的制度性排斥机制在劳动权益保障层面表现显著。尽管中国劳务人员大量进入,但几乎很难获得永久居留资格。这种身份剥离现象导致移民社群呈现高度流动性,且在空间分布上主要聚居于工程项目周边临时营地,与本地社区的互动频率非常低;同时,语言障碍进一步加剧社会隔离,极少的劳务人员能够使用孟加拉语进行日常交流,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度也极为不足。

与不丹的制度性隔离政策相比,孟加拉国的排斥机制更侧重于经济利用与身份排斥的并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短期合同获得劳动力红利,同时以制度性壁垒限制移民的社会融入。这种政策设计迫使中国劳务人员发展出独特的适应性策略,即在就业选择上依赖“熟人网络推荐”,在权益维护方面采取“集体协商”模式,在生活适应上构建“临时性社区”支持系统。这种“经济吸纳-身份剥离”的矛盾性政策虽短期内满足了劳动力市场需求,但长期来看损害了移民的社会融入质量,低居留率折射出制度排斥对移民长期发展的制约效应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移民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困境,也为理

① 陈琮渊,黄日涵.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74.

② 中国日报网.以人民为中心 做好新时代外交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专访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姚文[EB/OL].[2023-07-24].<https://ex.chinadaily.com.cn/exchange/partners/82/rss/channel/cn/columns/h72une/stories/WS64be36b4a3109d7585e4640d.html>.

解中国新移民的韧性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三、中国新移民的韧性生存策略

在南亚地区,中国新移民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排斥。这些排斥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各异,深刻影响着中国移民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路径。然而,中国新移民凭借自身的韧性和智慧,发展出多种适应性策略,以应对这些挑战。

(一) 民族网络驱动型(巴基斯坦少数民族)

巴基斯坦是中国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尤其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巴基斯坦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2010 年巴基斯坦已有近万名华侨华人,^①但这些移民在享受入籍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巴基斯坦的中国新移民发展出了多种韧性生存策略是一种宗教社群重构,例如拉瓦尔品第维吾尔族协会。拉瓦尔品第维吾尔族协会成立于 2007 年,^②拥有约 2000 名成员。该协会依托伊斯兰教,强化内部互助,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宗教社群。通过定期的宗教活动和社区聚会,维吾尔族移民不仅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这种宗教社群的重构,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还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巴基斯坦的维吾尔族移民通过宗教活动和社区组织,保持了与中国新疆的联系,同时也积极参与巴基斯坦的社会生活。这种宗教社群的重构,使得维吾尔族移民在巴基斯坦社会中找到了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困境。宗教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黏合剂,帮助维吾尔族移民在异国他乡重建了社会网络,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一策略突出显现了地缘经济节点依附:聚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为巴基斯坦的中国新移民提供了新的经济机遇。许多维吾尔族移民聚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城市,如吉尔吉特,承接中资项目衍生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包括餐饮、住宿、物流等,为移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2016 年,常住在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数量不到 4 000 人,主要为企业工人和经商者,但存在较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伊斯兰堡就有 1 万人,多来自建筑工程、IT 业和资源行业、商贸和留学签证公司等。^③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农业等。这些投资项目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2022 年末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对外承包工程人数达到了 7730 人,对外劳务合作人数达到了 1198 人。^④维吾尔族移民在这些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提高相关项目建设效率的同时,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通过地缘经济节点的依附,巴基斯坦的中国新移民不仅为他们在异国的生存发展筑牢了根基,也让他们在当地社会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二) 跨国流动型(印度、孟加拉国劳务人员)

印度和孟加拉国是中国劳务人员的重要目的地。这些劳务人员主要以短期合同为主,面临着较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他们发展出了多种韧性生存策略,如以合同循环迁移。合同循环迁移是指劳务人员在完成一个项目后,立即前往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继续工作。这种方式虽然增加了他们的生活不确定性,但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工作经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孟加拉国的中国新移民主要以劳务人员和商贸人员为主,形成了明显的劳务移民集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9 年孟加拉国的中国工程人员年末在外人数达到峰值,约为 1.58 万人,2023 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到了 8114 人(见下表)。目前在孟加拉国的中国海外新移民中,华侨华人的数量较少,多为随中资企业来孟加拉国工作的员工以及劳务人员等。这些劳务人员通过合同循环迁移的方式,维持了高流动性。同时,许多劳务人员在完成一个项目后,会选择前往其他国家继续工作,以获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

① 田宝剑,晏忠华.全巴基斯坦华人华侨联合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EB/OL].[2010-03-04].http://pk.china-embassy.gov.cn/sghd/201003/t20100304_1234467.htm.

②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巴拉瓦尔品第华侨华人协会成立[EB/OL].[2007-09-14].http://pk.china-embassy.gov.cn/sghd/200709/t20070914_1233486.htm.

③ 陈琮渊,黄日涵.搭桥引路: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68.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EB/OL].<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的职业发展机会。这种流动性的增强，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还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和职业网络。

表1 2011~2023年中国在孟加拉国外派工程人员及劳务合作人员数量情况

年份	对外承包工程		对外劳务合作	
	派出人数（人）	年末在外人数（人）	派出人数（人）	年末在外人数（人）
2011	3075	1885	27	247
2012	1492	1900	17	44
2013	1287	2197	95	49
2014	3690	3799	110	137
2015	2402	3335	115	119
2016	2669	4936	137	226
2017	4858	7861	214	336
2018	6739	12523	80	270
2019	7770	15532	83	303
2020	4050	7413	31	248
2021	5676	11626	372	458
2022	2014	8722	143	372
2023	3719	7820	73	294

数据来源：2012~2024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弹性身份策略：印度中资企业员工

印度中资企业员工主要就职于小米、OPPO等企业。由于印度的移民政策较为严格，签证限制较多，入籍难度较大。许多中国移民由于在印度面临较大的制度性障碍而难以长期定居。为规避居留限制，这些员工采用弹性身份策略，通过跨国岗位轮替的方式灵活应对印度的移民政策，保持在印度的合法居留身份。这种弹性身份策略不仅保障了员工在印度的持续工作，还为其创造了多元的职业发展机遇。员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岗位历练中，能够积累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升自身在职场中的竞争力。这种策略还包括了不丹移民群体的代际妥协型。不丹是中国移民较为特殊的目的地之一，主要接收移民群体及其后代。不丹的移民政策以血统主义国籍政策为主，拒绝双重国籍，强制移民后代本土化，但限制新移民进入。在这种背景下，不丹的移民发展出了代际妥协型的韧性生存策略。第三代移民通过国籍转换与文化守界策略实现在地扎根，目前，居住在不丹的新移民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其中多数已取得不丹国籍。然而，由于不丹不承认双重国籍，且采取双亲血统主义，对不丹外国人入籍有非常严格的年龄和居住年限要求等，^① 移民群体的代际差异明显。第一代移民大多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而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则在不丹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不丹的移民群体在保持与中国西藏的联系的同时，也在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第三代移民虽然放弃了中国的国籍，但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他们通过旅游业等途径，维持了与中国的跨境联系，但也有极少数中国公民通过婚姻等方式长久居留在不丹。这种国籍转换与文化守界的策略，使得不丹的新移民群体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在不丹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在国籍上已经不丹化，但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这种代际妥协型的策略，使得他们在不丹社会中以生存和发展。

据上，中国新移民在南亚地区通过差异化策略应对结构性排斥。在巴基斯坦，民族网络驱动型策略体现为宗教社群重构与地缘经济节点依附的双重路径；印度及孟加拉国的跨国流动型策略则以合同循环迁移为核心，通过多国间劳动力流动突破单一市场的制度限制，既维持经济收益又规避长期居留风险；而不丹移民群体的弹性身份策略则呈现代际妥协特征，第三代群体通过国籍置换与文化守界实现身份重构，在保留跨境文化纽带的同时完成本土化适应。这些策略共同构成中国新移民应对制度性排斥的适应

① 中国领事服务网。不丹——入境居留 [EB/OL]. http://cs.mfa.gov.cn/zggmcc/ljmdd/yz_645708/bd_646144.

性框架,其本质是通过社群资本激活、经济节点嵌入与身份边界重构,形成动态平衡的生存机制。

四、机制比较:流动性与嵌入性的动态模型

在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中国新移民面临的政策环境呈现显著的国别差异性,这种差异既源于各国移民治理理念的分野,也折射出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层影响。由此,通过构建“政策排斥强度-适应策略谱系”的分析框架,揭示排斥机制与移民策略之间的动态适配逻辑,呈现了对国际移民适应性机制的梯度认知,即政策排斥强度与适应策略谱系的差异化呈现。制度排斥强度与移民策略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动态适配关系。

在高强度排斥情境下,移民系统倾向于通过空间流动策略规避制度性壁垒,形成“地理套利”效应。这种策略的本质在于利用跨国空间的政策差异性,通过高频次、短周期的空间位移实现资源获取与风险规避的双重目标。其形成机制可归结为制度压力下的生存理性选择,移民通过将自身嵌入跨国流动网络,将静态的制度排斥转化为动态的生存优势。

中等强度排斥环境催生了基于社会资本的嵌入策略。当制度排斥呈现选择性特征时,移民倾向于依托既有的文化或宗教网络构建“制度外”生存空间。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嵌入媒介,通过宗教实践、文化仪式等非制度性渠道建立社会联结,形成对主流排斥机制的柔性抵抗。其理论逻辑在于,同质性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移民在有限的政策空间内实现最大化融入。

中低强度排斥情境下,经济理性主导的临时嵌入模式成为主导策略。这种模式下,移民通过参与短期经济项目实现生计维持,其策略特征表现为高流动性与低社会融入度的并存。形成机制可解释为经济机会导向下的理性计算,移民在权衡制度成本与经济收益后,选择将自身嵌入项目制经济网络,通过空间套利与技能转换维持收入稳定。这种策略虽能缓解短期经济压力,但长期存在身份固化与社会隔离风险。

低强度排斥环境催生了代际文化调适策略。当制度排斥呈现象征性特征时,移民系统倾向于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代际身份平衡。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构建“静态嵌入”的生存空间,通过保持文化独特性与有限度的制度妥协,在主流社会边缘形成文化飞地。其理论逻辑在于,文化资本具有跨时空的延续性,移民通过代际传递的文化实践,在制度接纳与身份保持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由此,国际移民适应性机制的三重理论维度:其一,制度压力与空间流动存在正相关关系,高强度排斥环境会强化移民的跨国流动性偏好,形成“制度推力-空间拉力”的作用机制;其二,社会资本的可转换性决定嵌入策略的有效性,宗教、族群等同质性网络能够降低制度排斥的负面影响,提升移民的社会融入度;其三,经济理性与身份认同存在张力平衡,短期经济收益的追逐可能导致长期社会融入的困境,形成“资本积累-身份固化”的结构性矛盾。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可以验证“排斥强度-策略选择”的动态适配模型,从而揭示移民策略的系统性与层次性特征,拓展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边界,并佐证了非制度性网络在移民适应中的关键作用,深化对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复杂性的理解,呈现制度环境、经济机会与文化认同的交互影响机制。由此可以看出,南亚国家的移民治理正经历从领土控制向身份管理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型既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需求,也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移民治理的复杂性特征。

五、结 语

从南亚各国对中国新移民的结构性排斥现象来看,其存在着自我强化的特征与不良后果。以印度为例,该国所实施的排斥政策使得当地华人规模不断萎缩。从学理层面分析,移民群体在地区经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Portes)提出的“社会嵌入性”理论所指出的,移民群体凭借自身的社会网络和文化联系,能够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动。印度华人规模的减少,意味着中印之间基于移民社会网络的经济纽带被削弱,阻碍了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深入合作。这种自我强化的排斥政策不仅影响了移民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也对中印两国的经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在巴基斯坦,采取的民族嵌入策略看似为移民提供了融入当地社会的途径,但实际上却固化了移民的边缘地位。这与埃里克森(Erikson)的“认同危机”理论相契合,移民在这种策略下难以获得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同,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巴基斯坦的民族嵌入策略虽然在短期内为维吾尔族移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和文化认同,但从长远来看,这种策略使得移民

在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方面面临诸多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和社会中的潜力。

中国新移民在南亚地区的适应性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对于高流动性群体,如劳务人员,他们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不得不牺牲家庭的稳定性。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视角来看,劳务人员选择在南亚工作,是基于经济收益大于家庭团聚成本的考量。然而,这种选择长期来看可能会对家庭关系和个人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劳务人员在频繁的跨国流动中,与家人的分离时间较长,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疏远,甚至出现婚姻破裂、子女教育缺失等问题。同时,长期的分离也会对劳务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增加其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风险。而低流动性群体,主要是少数民族移民,他们以身份让渡的方式来换取安全保障。但根据“发展机会理论”,身份的让渡使得他们丧失了跨境发展的能力,无法充分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和跨境联系优势,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少数民族移民在获得当地国籍或居留权的同时,往往需要放弃与中国的一些联系和资源,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优势和跨境联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寻求发展机会,从而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南亚各国在制定移民政策时,需要平衡国家安全与移民权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过度的排斥性政策会损害国家的长远经济利益和社会多元化发展。正如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所强调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和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南亚国家应该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为移民提供更多的权益保障和发展机会。通过制定更加包容和开放的移民政策,南亚国家可以吸引更多高素质的中国移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同时,中资项目在南亚的开展,应配套长期居留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新移民的稳定性和归属感,还能促进中资项目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局面。中资企业可以与当地政府合作,为劳务人员和技术专家提供长期居留的机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中资企业还可以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和互动,提升中国移民在当地的社会形象和影响力。综上,南亚各国对中国新移民的结构性排斥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程度,然而,这些策略在带来生存韧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悖论和政策规制力。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新移民发展出了多种适应性策略,这些策略在流动性和嵌入性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动态关系。后续研究需持续深化对中国新移民南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追踪探讨,此类探索不仅能为中国新移民在南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实践指引,更将通过实证经验的积累丰富国际移民理论的内涵,同时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与对策参考,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层面均具有显著价值。

Structural Exclusion and Resilient Adaptation: Social Adaptation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Under Comparative South Asian Immigration Policies

SUN Lifang¹, FANG Chaofen²

(1. Personnel Department, Yunnan Arts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2.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0)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migration policies of South Asian countrie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hich constitutes a structural exclusion of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India's visa restrictions and economic barriers have led to a shrinking Chinese population; Pakistan uses religious bindings to attract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s but restrict mobility; Bhutan's ancestry-based policies reinforce institutional segregation; Bangladesh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economic absorption and identity divestiture. In the face of exclusion, new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iated resilience strategies. That is, Pakistani ethnic minorities rel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and employment in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workers in India and Bangladesh migrate through contract cycles to make ends meet; employees of Chinese-funded enterprises use cross-border job rotation to circumvent residency restrictions; Bhutanese immigrants balance national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compromi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ynamic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exclusion intensity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migration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structural exclusion; resilient survival; Chinese immigrants from South Asia

(责任编辑:阮明阳)